

從戰略文化解析中共的軍事演習

Analyze Military Exercis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viewpoint of Strategic Culture

王崑義 Wang, Kun-Yi
東吳大學政治系兼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蔡裕明 Cai, Yu-Ming
台南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摘要 / Abstract

本文透過重新審視戰略文化的脈絡，用以探討中共的戰略文化之形成與轉變，並從中共軍事演習檢證其作戰方法與準則。本文以為，中共建構戰略文化的特點，主要包含數項幾個基本的思考要素：領導人的世界觀、領導人的戰爭觀與地緣戰略觀等。此三個基本的戰略思考，一直主導中共建政五十餘年來戰略文化之想定，也直接影響中共的戰略擘劃。而表現在軍事演習上，隨著國際環境之轉變，解放軍的軍事演習也以三種類型進行演練：單邊主義模式的軍事演習、雙邊主義模式的軍事演習以及多邊主義模式的軍事演習。本文最後指出，雖然中共對軍事演習進行各種不同類型的轉變，也意圖以聯合軍演實現其軍事外交的功能，達到「和平發展」目的，但因中共的戰

略文化所內涵的世界觀、戰爭觀和地緣戰略觀一直具有擴張性質的主觀意識，所以要客觀性的讓人接受中共所舉行的軍事演習是為了追求和平，恐僅為口號，並無法實質成為國際的理念。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forming and change of the PRC's strategic culture through surveying the skeleton of strategic culture, and evaluates the military exercises of the PRC in order to help readers to understand its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fighting.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use several points for constructing the PRC's strategic culture which include several essential factors of thinking: the worldview of leaders, the war view of leaders and geostrategy view of leaders. These three basic strategic ways of thinking always guide the scenarios of the strategic culture, and also directly affect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the PRC.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military exercise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ave three modes of proceeding: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mode of unilateral principle,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mode of bilateral principle and in the mode of multilateral principle.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reveals that the PRC is changing its military exercises into different modes, trying to use joint maneuvers to achieve the function of military diplomacy and the goal of "a peacefu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worldview, war view and geostrategy view of the PRC's strategic culture always have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expansion hidden behind. Even if the PRC wants the world to believe that by holding the military exercises it seeks the peace, the world might see it just as a slogan of Chinese leaders, not as accepted international practice.

關鍵詞：戰略文化、軍事演習、聯合軍演、和平發展

Keywords: strategic culture, military exercise, joint maneuver, "peaceful development"

壹、前言

文化論述與研究在後冷戰時代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主軸，文化同時也逐步被引入國家安全研究之中，論者認為文化將會影響國家行為乃至於國家戰略。¹許多學者希望從政治文化當中發展出解釋國家戰略行為的分析架構，如史耐德（Jack Snyder）在1977年試圖建立戰略文化的分析途徑，藉此分析蘇聯的核武準則。²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1995年所提出的「文化現實主義」（cultural realism）從分析明帝國時期的安全政策，認為社會的特質會影響著國家的行為。³而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所提出的未來衝突將沿著文明斷層線（fault line）展開，⁴此套文明間的戰爭論述，成為在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之後，美國全球反恐戰爭（Global Warfare on Terrorism）當中最有力的註腳。

將戰略文化做為研究途徑，旨在挑戰與修正現實主義（realism）論者有

¹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Ken Booth and Eric Herring, *Keyguide to Information Source in Strategic Studies* (New York: Park Avenue South, 1994), pp. 111-112. 莫大華，〈中共戰略文化初探〉，《中國大陸研究》，第39卷第5期（1996年），頁38-52；莫大華，〈戰略文化之研究〉，《國防雜誌》，第11卷第11期（1996年），頁73-85；莫大華，〈戰略文化：戰略研究的文化途徑〉，《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6期（1996年），頁39-52；莫大華，〈戰略文化與軍事準則理論之探討〉，《國防雜誌》，第12卷第3期（1996年），頁3-14；莫大華，〈美國的戰略文化與戰爭方式〉，《美歐月刊》，第11卷第11期（1996年），頁37-54；莫大華，〈戰略文化與國防政策—中華民國的戰略文化與軍隊文化〉，《國防政策評論》，第1卷第4期（2001年），頁33-56；沈明室，〈中共戰略決策的文化分析〉，《東亞季刊》，第33卷第1期（2002年），頁1-23；莫大華，〈戰略文化研究的辯論與趨勢—兼論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臺海飛彈危機事件的戰略文化研究〉，《復興崗學報》，第75期（2002年），頁73-93；施正權，〈從比較戰略文化看戰爭與和平：以美國和中共為例〉，《哲學與文化》，第31卷第4期（2004年），頁25-60。

² Jack L. Snyder,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Ca: RAND, 1977).

³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⁴ 杭亭頓，〈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黃裕美譯（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年），第10、11章。

關於權力的命定式假設，他們認為在無政府（anarchy）的狀態下，國家將戮力擴大其權力基礎，因此，奈伊（Joseph S. Nye）與瓊斯（Sean Lynn-Jones）才會認為，戰略研究受到美國中心主義之影響，並忽視「戰略的國家風格」（national styles of strategy）。⁵

本文希望透過重新審視戰略文化的研究理路，用以探討中共的戰略文化的形成與轉變，檢證中共軍事演習，以理解其作戰方法與準則。畢竟，長期以來中共始終是台灣軍事安全威脅之根源，作者希望透過本研究，能有助於未來兩岸之間有關於信心建立措施（CBMs）之建構與作法。⁶本文除前言外，其次探討戰略文化理論與國家安全政策的連結關係，再者闡述中共戰略文化之形成，接續說明中共戰略文化與軍事演習之關連性，最後為結論。

貳、戰略文化與國家安全政策

冷戰時期在政治學界所廣泛進行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研究，早已發展成解釋國家行為的理論架構。所謂的「政治文化」乃是特定社會在政治活動當中，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價值、觀念、認知與評估。佛巴（Sidney Verba）認為政治文化包含經驗性的信仰（empirical beliefs）、表意符號（expressive symbols）與價值系統（values）所結合而成體系，⁷其與戰略文化可成為相互為用的研究領域。

史耐德（Jack L. Snyder）認為戰略文化是國家戰略社群（national strategic community）所共享的信念、制約情感反應與行為模式之總和，其透過教導

⁵ Joseph S. Nye and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n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 (Spring 1988), pp. 14-15.

⁶ 有關於信心建立措施之類別，大致上有宣示性措施、資訊性的透明化措施、溝通性措施、限制性措施、查證性措施、規範性措施與綜合安全措施。參見郭臨伍，〈信心建立措施與兩岸關係〉，收錄於《信心建立措施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台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2001年），頁170。

⁷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或模仿來分享對於戰略之態度。⁸克蘭（Yitzhak Klein）以為戰略決策是對戰爭的一種主觀判斷，因此不同的軍事組織、國家或民族對待暴力、戰爭的方法都各有不同，而構成戰略思想多元化。⁹

江憶恩則是將戰略文化視為一套整合的「符號體系」（system of symbols），藉由軍事武力的角色與效率，在國家間的政治事務當中建立起普遍性與持久性的戰略偏好（strategic preference）。同時，戰略文化的內涵再包含兩個部分，一個是有關於戰略環境的假設、戰爭在人類事務的角色、敵對與威脅的本質以及武力使用的有效性等；另一個部分則是實踐性的層次，國家戰略的選擇是否能夠有效處理威脅，以及處理上述三項問題的方式。¹⁰另外，詹姆斯（Ferguson R. James）認為戰略文化會對於決策者的決策模式、戰略偏好及使用軍事力量解決爭議的傾向產生作用。¹¹賈克森（Carl Jacobsen）認為戰略文化是持續性對於威脅與使用威脅的一組信念、價值與習慣，並受到地緣政治、歷史與政治文化所影響。¹²葛瑞（Colin S. Gray）則結合地理與戰略文化的研究，將戰略文化視為社會所傳遞的一組態度、價值、信念以及偏好的程序，這些並由社會的成員所學習、訓練與教導新成員。¹³

我國戰略學者鈕先鍾以為文化是一種概括性的概念，並以歷史、地理、社會、經濟等因素為根源，所表現出來即為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明瞭一國的民族性之後，始能瞭解其戰略思想。¹⁴莫大華更是結合眾多學者的定義，將戰略文化視為國家戰略社群成員對於軍事體制運用在政治目標的達

⁸ Jack L. Snyder,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p. 8.

⁹ Yitzhak Klein, "A Theory of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 No. 1, pp. 3-24.

¹⁰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 24.

¹¹ Ferguson R. James, "Inclusive Strategies for Restraining Aggression- Lessons from Classical Chinese Culture," *Asian Philosophy*, Vol. 8, Issue 1 (March 1998), p. 31.

¹² Carl Jacobsen,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cited in Ken Booth and Russell Trood, eds, *Strategic Cultur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St. Martin's Press), p. 8.

¹³ Colin S. Gray, "Geography and Grand Strategy,"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1991), p. 313.

¹⁴ 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頁23。

成上，所共享之習慣行爲模式與價值符號體系。¹⁵而中共學者李際均則以為，戰略文化是在歷史與文化傳統上所形成的戰略思想與戰略理論，並根據此種思想與理論指導戰略行爲與和影響社會文化與思潮。¹⁶

一、戰略文化的發展歷程

戰略文化研究的根本性假設就是決策菁英即使面臨到類似的決策環境時，不同的戰略文化背景將會產生不同的決策風格與戰略偏好。這使得戰略文化的研究不僅可以用來理解一國政府所採取之政策，並可以預測其戰略思想的發展趨勢以及未來可能之作爲。¹⁷

依照江憶恩的看法，其實戰略文化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的演進過程。¹⁸第一個時期大約起於 1980 年代初期，其重點在於解釋美國與蘇聯不同的核武戰略，其差異的根源在於雙方不同的歷史經驗、政治文化以及地理位置。然而第一個時期卻出現兩個問題，第一，既然戰略文化受技術、地理、組織文化與傳統、歷史實踐、政治文化、國家特質、政治心理、意識型態、甚至國際結構所影響，這些變數本身已可以影響戰略決策，戰略文化如何與這些變數明確區分？第二，既然戰略思想將影響國家行爲，因此如何透過思想與行動來評估戰略文化？許多學者皆同意戰略文化的存在，但是其定義仍然模糊，特別在偏好的形成、價值、國家的行爲，至此，戰略文化成爲偏好的促發者（generator），不變的價值與偏好之間的媒介，以及行動的力量、價值與新價值的活動力量。¹⁹

第二個時期約略從 198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末期，戰略文化的研究深入國家內部戰略決策，認爲戰略文化是戰略決策領域當中，政治主導權擁有

¹⁵ 莫大華，〈戰略文化：戰略研究的文化途徑〉，頁 41。

¹⁶ 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38。

¹⁷ 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頁 23。

¹⁸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p. 2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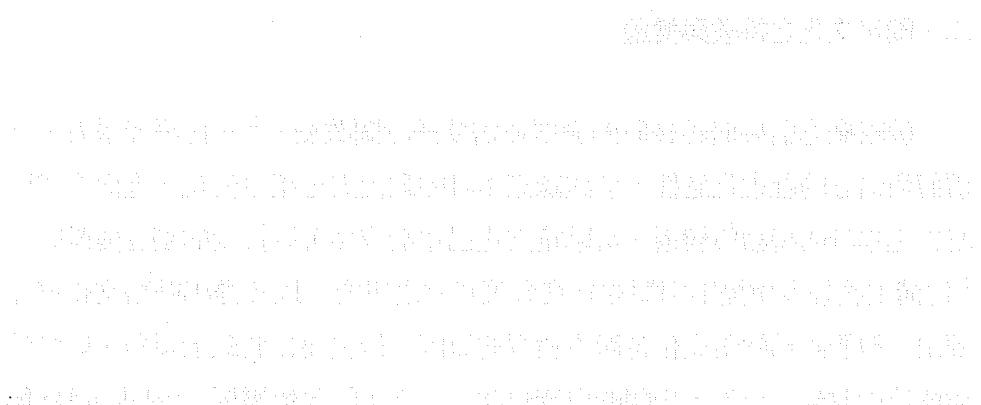
¹⁹ Jeffrey S. Lanti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2002), pp. 87-113.

者手中的工具。²⁰進一步將戰略賦予文化上或法律上可以接受之合法性，藉此消除誤導或可能的政治挑戰。並且戰略文化與實際的政策行為之間的落差，主要是因為政策經常反應國家利益或國家內部各組織的利益，因而戰略的選擇反而受限於這些利益的衝突與妥協。

第三個時期認為戰略文化本身也會進行轉變、調整或適應。柯爾（Elizabeth Kier）認為戰略文化應包含三個層次：國際政治與戰爭本質的評估、軍隊、國家與社會關係，以及國內組織、技術和官員與軍隊的關係。²¹戰略文化研究此時已超越國家層次，而試圖從體系層次上，探討國際規範對國家認同的影響。且從功能上看，國際規範不只是限制國家的行為，而是通過改變國家的認同，重新建構國家的利益，最終根據新的國家利益建構新的戰略行為。這同時也是溫特（Alexander E. Wendt）所謂建構主義的理念原則。

²²

綜整上述有關戰略文化的定義與發展回顧，本文以為戰略文化是由三道座標所組成的立方體。三道座標為戰略觀、安全觀以及戰爭觀，而整個結構體的外在指標則是受到世界觀與地理觀之影響，參見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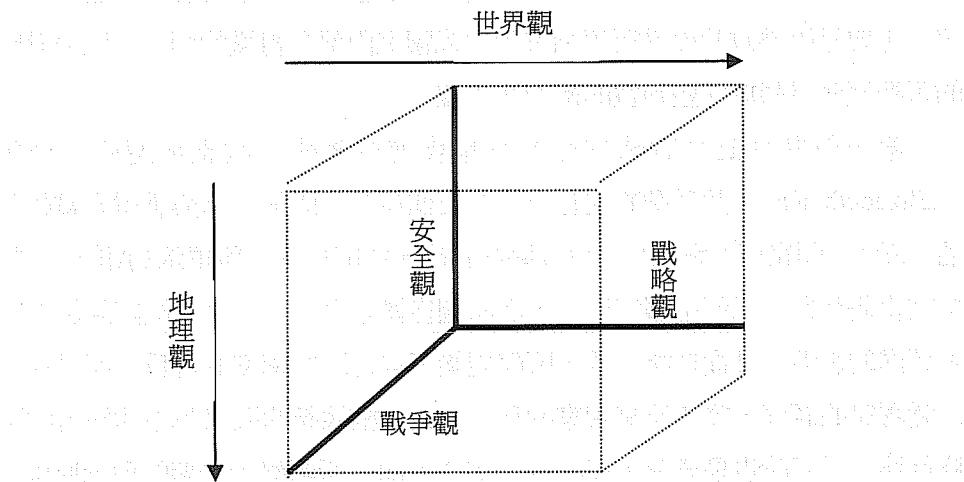


²⁰ Bradley Klein, "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 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se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4 (1998), pp. 133-148.

²¹ Elizabeth Kier, "Culture and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1995), pp. 65-93.

²² Alexander E.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1-425;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圖一) 戰略文化的思考架構



(圖一是由作者自繪，主要表述一國的戰略文化是由一整套世界觀、戰略觀、地理觀所組合而成的戰略思考架構，它是受到一國的安全觀與戰爭觀的影響所呈現出來的戰略價值體系。)

二、戰略文化之持續與變遷

戰略概念需要歷經長時間發展並需要長時間改變。²³文化研究學者認為價值與信念的社會化過程，會讓國家本身的政治文化產生變化，進而形成戰略文化本身的持續與變遷。當戰略文化已逐漸成為可以接受的獨立變數時，²⁴建構主義論者曾提出相關的外交政策建立之研究，以及提出戰略文化變遷源由。他們認為戰略文化會產生變遷的原因，最主要在於政治災難、威脅轉變與技術改變。另外，相關的研究也顯示，文化的改變需要長時間的發展與修正，並且主要的文化變革需由最高階層的領導人士來推動。²⁵

許多戰略文化研究的學者認為，文化本身不太容易改變。但是突然的政

²³ Michael O'Keefe, "Enduring Tensions in the 2000 Defense White Pap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 49, No. 4 (2003), pp. 532.

²⁴ Lanti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 104.

²⁵ James Dewar, et al, *Army Culture and Planning in a Time of Great Change*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6), pp. 2-3, 8, 42.

治災難卻會改變國家傳統的戰略文化，如革命、戰爭或經濟災難，以及伴隨而來的心理壓力，都會間接促成國內各團體乃至於國家戰略社群去建構一種新的政治文化風格。換句話說，外部的震撼會徹底挑戰既存的信念，並修改過去歷史成長的脈絡。

戰略思想本身產生矛盾與衝突時，外交政策行爲也可能會改變戰略文化的取向。例如，當民主國家必須使用其軍事力量才能夠防範民主被破壞時，國家常會面臨到戰略文化的兩難（strategic cultural dilemma），此時會重新界定外交政策的取向，甚至重建對於歷史的解釋。²⁶再者，威脅轉變以修正其戰略利益，更形成不同於以往的戰略文化。而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之後，美國的學者才驚訝的發覺到，其對於敵人的戰略文化瞭解的太少，也因此要嚇阻傳統與非傳統的敵人，唯有瞭解對手的戰略文化來著手，²⁷這就使得對於戰略文化的理解，必須從以國家為中心（state-centred）到以社會脈絡為中心發展。

最後，技術或國際環境的變化而來改變戰略文化。事實上，後九一一時期國際地緣政治環境已產生結構性變化，並拓展傳統上對於國家安全或軍事安全之界定，國家也必需面對來自全方位的挑戰，國家的戰略文化也隨之發生轉變。一個國家對於戰爭的規劃，主要應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在戰場上直接對抗的部份，另一個就是在國與國之間的對抗當中，間接對抗的部分，如輿論戰、心理戰或駭客戰等。實際上，當代戰爭儼然成為不同的型態，其所關注的就是行爲者與行動，行爲者不再只是國家，行爲者也不再只是傳統的軍事行動。更進一步，戰略文化的研究需要分辨抽象的戰略概念與真實的戰略，從戰略觀、世界觀與戰爭觀來建構一個國家的戰略文化。

事實上，當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提出對於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典範上挑戰時，戰略文化學者也極力呼籲「將文化找回來」（bringing

²⁶ Lanti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p. 111-112.

²⁷ Barry R. Schneider and Jerrold Post, eds. *Know The Enemy: Profiles of Adversary Leaders and Their Strategic Culture*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 U.S. Air Force Counter Proliferation Center, 2002).

culture back in), 並且整合戰略文化之形成、應用與改變。²⁸例如，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就提出一些新的體系概念，如規範（norm）、文化（culture）、認同（identity）等。²⁹「規範」是指涉及確定合適行為的標準，以塑造政治行為體的利益，協調它們的行為。「文化」是由各種不同的規範和認同所構成，它受法律和習俗所承載，作為一種寬泛的符碼，標誌著民族國家權力與認同的集體模式。「認同」概念則是一個簡潔的符碼，用來描述行為者、民族和國家的建構過程。因此在卡贊斯坦的觀念中，集體認同和等同於文化規範之概念。³⁰

在「戰略文化」的理路下，建構主義者認為一個屬於霍布斯式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國家為因應生存之所需，必然根據主權之原則，以建立國家的安全。溫特就認為主權原則為國家的特色與安全提供準則，讓國家得以暫時的免於他國的侵略。在溫特的眼中，主權是一種制度，惟屬於某種主體間的理解與預期才得以存在，因此，沒有他國就沒有主權。理解與預期不僅造就了特殊的國家（主權國家），而且，因為認同的相關性，它也建構出特殊的共同體。此種共同體的實質是承認各自在自己的領土範圍內運用排他性的政治權力。而這些認可構成一個空間上，並非是功能上有區別的世界。³¹

主權本為一種制度，那主權國家的制度，又如何透過社會互動得以衍生？它又會如何產生認同與利益的結構呢？溫特認為需要有兩個條件：其一必須有密切、規律之相互作用；其二是行為體必須不滿足於預先存在的認同與相互作用的形式。在此種條件之下，主權國家的活動至少會以三種方式來改變對安全與權力政治的理解：第一，國家將根據維護他們對特定領土的所有權，來界定自己的安全。第二，如果國家成功的使主權規範內化，國家就

²⁸ Lanti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 113.

²⁹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³⁰ Peter J. Katzenstein,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in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

³¹ Alexander Wendt,〈無政府狀態是由國家造就的：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刊於James Der Derian 主編，秦治來譯，《國際關係理論批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頁 162。

會更尊重他國領土權。第三，從國家正在進行社會化以教育自己，以及主權取決於他國的承認這一度上來說，國家能夠承擔得起更多的依賴於國際社會的制度，而較少依賴於個別國家的手段，尤其是依賴於軍事實力的手段來保護自己的安全。³²

三、軍事演習與戰略文化

在論理上，戰略文化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理念層次、評估層次與實踐層次。在核心的理念層次部分，主要涵蓋一套世界觀與歷史觀，以及用來支撐這套世界觀與歷史觀的方法論，³³其涉及到不會經常變動的部份，如地理、歷史等對於戰略問題所擁有的充分知識；而在中層的評估層次，主要涵蓋戰略準則的發展與調整、武器的獲得與危機決策之影響，該部分會隨著客體的變動而有所調整；而在評估層次最終要從實踐過程中來總結，因此實踐層次則展現從戰爭、低強度衝突（low-intensity conflict），再到軍事演習的工具性利用等。³⁴

事實上，戰爭常被戰略研究者用來檢證戰略文化的型態，其中主觀的判斷與臆測就成為戰略決策的主要行為模式。³⁵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戰略研究者已經不再樂見透過戰爭來驗證戰略文化的型態，因此，本文以為軍事演習可以用來驗證戰略文化的型態，並從在平時的部署、演練與政治的運用上，探索有關國家軍事力量運用的普遍觀點。

軍事演習就其本質而言，可以分為針對型、防禦型與嚇阻型，或單純的軍種協調演練。通常不同形式的軍事演習會造就不同種類的戰略準則、武器獲得與危機決策的過程。其中，「針對型的軍事演習」會增加軍備競賽（arms race）與戰爭的可能性，較為著名的戰例就是 1914 年德國、奧地利與俄國透

³² Wendt, 〈無政府狀態是由國家造就的〉，頁 164-165。

³³ 張亞中與李英明，《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台北：生智文化公司，2003），頁 2。

³⁴ Stuart Kinross, "Clausewitz and Low-Intensity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7, No. 1 (March 2004), pp. 35-58.

³⁵ 莫大華，〈戰略文化：戰略研究的文化途徑〉，頁 47。

過動員所舉行的軍事演習，反而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³⁶「防禦型的軍事演習」旨在作為軍隊演練，用以防範假想敵可能進行的潛在攻擊。而「嚇阻型的軍事演習」則是對潛在敵人所做的一種威嚇其發動攻擊之行為。

若從戰略上來思考，軍事演習有四項戰略上的意義。第一、威懾意義。威懾意義通常是指針對性軍演，對外展現軍事實力以達到政治目的，對內則有提振民心士氣與凝聚共識之作用。第二、實戰意義。實戰意義通常是一種作戰的模擬，對於實戰的先行預演。第三、交流意義。兩國軍事演習或是透過軍事外交可以促進兩個國家之間的瞭解、友誼、合作與共同發展，其中軍艦互訪是雙方軍事交流合作的基礎部分。第四、軍事轉型（military transformation）之參考依據，從演習的過程當中修正戰鬥數據與戰術指導。³⁷

另外，從軍事交流的意義上來思考，兩國以上的聯合軍事演習，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以潛在對手為假想敵的聯合軍演；第二、為檢驗編制、武器裝備、發展作戰思想的聯合軍演；第三、因應非傳統安全威脅所進行聯合搜救、人道援助之聯合軍演。³⁸

若從聯合軍演的方式來看，現今聯合軍演凸顯以下三種方式：第一、指揮所演習方式，演習在聯合軍隊司令部內或是聯合軍隊司令部，與有關軍兵種司令部之間進行，通常無實兵或少量實兵參加，此類聯合軍演，目的為演練各級指揮員和參謀人員的指揮、協調之能力。第二、野外訓練演習的聯合軍演。旨在想定作戰條件下聯合軍隊於野外進行的單方或對抗性演習。第三、電腦輔助模擬訓練演習，此為利用電腦模擬技術與設備，對聯合軍隊指揮員和參謀人員進行之演練。³⁹

³⁶ 1914年當時德國的戰略假定是在俄軍完成部署前先擊敗法國，在擊敗法國之後再來擊敗俄國。法國也明瞭德國的戰略規劃，遂暫守中立以讓俄國有足夠時間進行動員。但當有一方進行局部動員之時，另外一方也隨之進行動員，導致戰爭的不可避免。

³⁷ 王崑義與蔡裕明，〈兩岸認同中的戰爭論述與非戰論述—2004年三二〇以來的發展〉，刊於朱新明主編，《胡溫體制下的平衡戰略—思維政策》，（台北：遠景基金會，2005），頁247-248。

³⁸ 《文匯報》，〈中俄軍演威懾潛在對手〉，2005年8月18日，版6。

³⁹ 杜立平與田朝暉，〈解讀中俄聯合軍演：演什麼，怎麼演〉，《解放軍報》，2005年8月17日。

後九一一時期軍事權力不只是保障國家安全的方式，也是預防性外交的工具之一。所謂「預防性外交」是指限制一場國際危機的發生，或制止一場戰爭發生而所採取的手段，目的在防止情況繼續惡化之行動，這些手段包括非軍事性與軍事性。非軍事性的手段，主要包括有使用斡旋、干涉、談判與危機處理等。而軍事性的手段上，尚包含對軍事權力消極或積極之使用，前者如信心建立措施、軍備管制、非武裝區等，後者則如嚇阻、安全承諾、保持區域性的平衡、威脅或有限的使用武力。⁴⁰而軍事演習卻是軍事性使用的例行性手段之一，按性質又可分為進攻性和防禦性兩大類；按參加演習的物件大體可分為三軍例行聯合演習、軍種專業演習、兩國或多國聯合演習等，所以軍事演習也被視為是一種預防性外交的手段，而且也主要的手段之一。

參、中共戰略文化之形成與演變

中共戰略文化之特點，一般包含幾個基本的思考要素：（一）領導人的世界觀、（二）領導人的戰爭觀以及（三）地緣戰略觀。這三個基本的戰略思考，一直主導中共建政五十餘年來戰略文化之想定，也間接影響中共的戰略規劃。

一、領導人的世界觀與戰略文化的建構

影響中共戰略文化建構最重要之因素，首為領導人的世界觀，也就是他們對世局之判斷所奠定之戰略發展方向。這不只對中共的政治、經濟發展戰略產生重大的影響，對軍事戰略之想定也有相當不同的面貌出現。

（一）毛時期的備戰文化

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爭危險，

⁴⁰ Michael S. Lund, *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s: A Strategy for Preventive Diplomacy*, 2d ed.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for Peace, 1997), p. 31, 203.

使第三次世界大戰避免爆發的鬥爭力量發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覺悟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產黨能夠團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並使之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⁴¹在中蘇結盟的情況下，毛澤東曾多次談到戰爭有可能被推遲或制止，和平有可能得以維持的觀點。但是，在中蘇兩國關係破裂以及美國在越南擴大戰爭的情況下，毛澤東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發生重大轉折，並曾一度提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要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之觀點。⁴²毛澤東設定此項軍事戰略之意義為：一、針對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可能升級，並波延中國大陸，因此應該準備早打；二、認為戰爭打起來就沒有界線，因此要準備大打；三、針對核威懾所帶來的威脅性，因此要打核戰爭。⁴³

就因毛澤東對 1960 年代以後世局的判斷是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據此建立其世界觀，於是從 1960 年代開始，毛澤東就把 1950 年代所追求的「趕超戰略」，⁴⁴也就是以蘇聯發展模式為師，著重在重工業發展取代輕工業與農業發展的模式，轉變為以「三線戰略」作為發展的模式。「三線戰略」主要是以內地「八省一市」做為重點發展的區域，這些地區與沿海區域相較，毛認為是不太容易遭致攻擊。毛澤東就指出：「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佈局逐步平衡，並且利於備戰。」⁴⁵配合「備戰」的經濟發展觀，毛澤東也另外提出「以我為主」的國防自力更生原則，積極發展「兩彈一星」，以作為其國防現代化之指標。⁴⁶

（二）鄧時期的發展文化

1978 年 12 月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鄧小平針對國際形勢的變化，重新認識戰爭與和平問題，並作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個大問

⁴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86。

⁴² 劉繼賢與張全啟主編，《毛澤東軍事思想原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頁 197-198。

⁴³ 劉繼賢與張全啟主編，《毛澤東軍事思想原理》，頁 198。

⁴⁴ 周其仁，《農村變革與中國發展，1978-1989》，（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 64。

⁴⁵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頁 270。

⁴⁶ 劉繼賢與張全啟主編，《毛澤東軍事思想原理》，頁 105-106。

題」的新判斷，此讓中共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從「戰爭與革命」朝向「和平與發展」的目標上轉變。⁴⁷1983年2月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共中央幹部談話時就明確指出：「大戰打不起來，不要怕，不存在什麼冒險的問題。以前總是擔心打仗，每年總要說一次。現在看來，擔心得過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來。」⁴⁸1984年10月，鄧小平進一步指出：「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係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意義。」⁴⁹

1985年6月，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明確指出：「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們好多決策，包括一、二、三線的佈局，山、散、洞的方針在內，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這幾年我們仔細地觀察形勢，……由此得出結論，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據對世界大勢與中共周圍環境之分析，中共在鄧小平時期以後翻轉原本認為戰爭的危險性與急迫性。⁵⁰因此從1985年6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之後，中共在對國際形勢和政策上產生兩個重大的轉變：第一、對戰爭與和平的認識產生變化，認為長的時間內尚不至於發生世界大戰；第二、對外政策改變反對霸權主義的「一條線」戰略戰線，修改為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⁵¹

在此這兩個轉變基礎上，鄧小平除確立一個「周邊和平與發展」的國際戰略之外，並且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極力扭轉毛澤東強調「三線戰略」的發展模式，轉而推出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提出「外引內聯」的經濟建設佈局。

⁵²在國防發展戰略上也要求「在本世紀內軍隊要忍耐，待國力增強再拿出更

⁴⁷ 顏聲毅，《當代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44。

⁴⁸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25。

⁴⁹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96。

⁵⁰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126-127。

⁵¹ 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主編，《鄧小平戰略思想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頁4。

⁵² 何思慎，〈中共經濟發展戰略—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東亞季刊》，第23卷第4期（1992年4月），97-98。82-108。

多的資金更新武器裝備」。⁵³同時也做出裁軍一百萬的重大決策，並確定國防科技、國防工業、國防後備力量建設的新理路。

(三) 江時期的穩定文化

1990 年代江澤民主政時期的世界觀又有轉變，從 1992 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到 1997 年所舉行的「十五大」以後，中共一直認為後冷戰時期，世界和平與安全之威脅，主要來自於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之作爲。由於這個世界觀之認定，中共領導人在思考如何應對時，就把它連結到「綜合國力」的較量上。既然世界各國已經把競爭的形勢轉爲綜合國力的較量上，因此，他們就認爲應該集中精力和一切力量，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

在確立這樣的世界觀之後，中共在冷戰後所制訂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總目標，即爲現代化建設創造和保持良好的國際環境，特別是良好的周邊環境。也就是說，在國際政治上，中共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區域政治上，中共採取改善和發展同所有周邊國家關係的方針，通過與周邊國家政治關係的改善、經貿關係的發展及建立信任措施等，創造和保持穩定的周邊環境，進而實現中共的安全與發展利益。⁵⁴

特別是在 1997 年 3 月，中共在與菲律賓共同主辦的東協區域論壇中，首次提出適合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的「新安全觀」，其主要的概念是指：國家安全不僅是軍事上的安全，而應包括經濟、科技、政治、軍事等在內的綜合安全，形成包括經濟、科技、政治、軍事在內的綜合國力的新安全觀。⁵⁵不同於先前的生存式冷戰安全觀，中共新安全概念更關注於周邊區域上，防止戰爭的爆發、避免捲入任何的區域衝突，以及在戰爭不可避免時贏得戰爭的勝利。⁵⁶

在此之後，中共即不斷以此新安全概念，作爲它面對冷戰後國際新形勢

⁵³ 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主編，《鄧小平戰略思想論》，頁 5。

⁵⁴ 張召忠與周碧松，《明天我們安全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頁 11。

⁵⁵ 張召忠與周碧松，《明天我們安全嗎》，頁 11。

⁵⁶ Yan Xuetong, "In Search of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World Affairs*, Vol. 1, No. 4 (1997), pp. 51. 50-58.

之政策方針。1997年4月，江澤民在訪問俄羅斯時，與俄所共同簽署發表的「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中，就強調：「雙方主張確立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安全觀，認為必須摒棄冷戰思維，反對集團政治，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或爭端，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以對話協商促進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通過雙邊、多邊協調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⁵⁷

在根本意義上，中共所提出的「新安全觀」，在安全內容和實現安全的途徑上，是強調不同於「冷戰思維」的新世界觀。在安全的內容方面，中共在注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之同時，也注重政治和社會穩定、經濟安全、能源環保等新型的安全問題。因此，對內它採取政治上高壓的統治，以維持政治上的安全；對台灣而言，它採取不放棄武力的使用，以維持它的主權與領土的完整。所以中共所謂的「新安全觀」，實質上是內外有別，並有不同的針對對象的。

當然，就因內外有別，在地域和國際安全上，中共仍然依循毛澤東時代以來主張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原則基礎上，以建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並使之成為全球與地區安全的政治基礎和前提；各國在經濟領域加強互利合作，相互開放，消除經貿交往中的不平等現象與歧視的政策，逐步縮小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以謀求共同繁榮，作為全球和地區安全的經濟基礎。⁵⁸

（四）胡時期的和平文化

胡錦濤上台以後，在經歷中共十六大的人事調整與SARS疫情衝擊之後，一直在進行一場國際戰略的「和平轉型」。⁵⁹此項轉型的起源，主要是從中共十六大的舉行開始，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有關「國際形勢和對外工作」部分，曾提出一個「和平與發展」的主軸，並總結八條對於國際與外交工作

⁵⁷ 顏聲毅，《當代中國外交》，頁80。

⁵⁸ 靳希民，《國際安全與安全戰略》（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頁33-34。

⁵⁹ 楊潔勉，《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外交政策比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38；孫哲，〈結構性導航：中國「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方略〉，《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總第280期（2003年12月），頁58。

的具體經驗，以及以「四個主張」和「六個繼續」作為中國新時期外交工作的指示。⁶⁰這個報告不但標誌著中共正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也呈現出中共政府試圖從「戰時革命體制」的國家，向法理型的「現代體制」國家轉變，⁶¹它更修正中共的國際戰略觀、國家身份定位以及具體的對外政策行為模式，⁶²充分展現著胡錦濤時期中共的和平文化的世界觀。

事實上，中共從2003年高喊「和平崛起」以及到2005年提及「和平發展」的世界觀，此概念正逐步成為中共現階段對外政策方向。胡錦濤在2005年9月26日在聯合國成立六十週年大會上，發表「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其中揭諸中共理想中的發展方向：第一、建構和諧世界乃因當代國際政治的衝突是由於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所造成；第二、和平是人類社會實現發展目標的根本前提；第三、肯定聯合國的地位與作用，聯合國機制的存在促進各國的協商與合作。⁶³

胡錦濤時期會以「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作為新時代的戰略轉型，主要是因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以軍事為中心所進行的反恐戰爭一直呈現「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的作風，並不斷祭出「先發制人」(preemptive war)的戰略擴張，用以主導所有的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⁶⁴特別是美伊戰爭以後，美國做為全球主宰「超級霸權」角色，更讓中共深感有必要重新建構「有中國特色」新國際戰略的急迫性。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研究員王逸舟

⁶⁰ 所謂「四個主張」為順應歷史潮流，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維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並且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六個繼續」為繼續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繼續加強睦鄰友好，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加強區域合作；繼續增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繼續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繼續堅持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繼續廣泛開展民間外交。參見江澤民，〈江澤民在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02年11月8日。

⁶¹ 蔡裕明，〈法治的弔詭：中共『依法治國』的現實與考量〉，《中共研究》，第36卷第3期（2002年3月），頁27-36。

⁶² 馮玉軍，〈2003年中國外交〉，《現代國際關係》，2003年第12期，頁37。

⁶³ 胡錦濤，〈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2005年9月16日，text from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news/971778.htm>。

⁶⁴ David Bromwich, "Acting Alone," *Dissent*, Winter 2003, pp. 19-21.

就分析 2003 年以來，美伊戰爭之後的全球發展特點指出：第一、在「一超多強」力量格局不變、大國戰略安全關係相對穩定前提下，地區熱點和局部戰爭繼續頻繁出現，危及鄰國與周邊地區的安全與和平；第二、恐怖活動已經變成國際焦點議題，「文明的衝突」將加劇；第三、戰爭型態改變，由少數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所發動的高科技戰爭，加強軍事衝突的不對稱特徵；第四、國際建制（regime）網絡遍佈世界各個角落的不同領域，傳統國際政治學所謂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命題，受到全球範圍制度化的約制。

⁶⁵

因此，「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在戰略層次上是中共在胡錦濤時期對於美國在九一一事件以後，以軍事手段解決恐怖主義問題的反動。在美國仍然維持它在國際間超強地位的局勢下，大國幾乎對國際事務已經沒有插手的餘地。為解決這種窘境，中國於是寄望「和平理念」能夠凝聚國際力量，用以分散美國獨霸的強勢作為。在理論意義上，國際關係理論常出現崛起的強權與既存的強權之間會發生無可調和的衝突，因此中共認為有必要設計出一套「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說明中國的崛起將不同於過去德、日崛起的衝突模式。

從以上四個時期不同領導人所出現的不同的世界觀，讓中共軍事戰略的發展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各時期的特質與內涵如表一。

⁶⁵ 李慎明與王逸舟主編，《2004 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10-11。2004 年 2 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於法國國民議會的演講也指出，中國將推動「多極主義」。他說，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中國主張國際關係民主化，透過對話和合作解決爭端，世界上的事情應由各國平等協商，反對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參見胡錦濤，〈胡錦濤主席在法國國民議會的演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text from <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tt/hzxcfofsg/t59124.htm>，2004 年 1 月 27 日。

(表一) 中共的世界觀與軍事戰略發展過程

解 放 軍 各 階 段 軍 事 戰 略 發 展 過 程	時 期 區 分	毛澤東時期	鄧小平時期	江澤民時期	胡錦濤時期
客觀戰略研究評估		1.中國貧窮落後 2.解放軍裝備落後 3.中國來自於帝國主義與霸權主義侵略之威脅 4.大規模戰爭	1.避免戰爭以創造和平 2.世界大戰可以推遲 3.因應小規模局部戰爭	1.避免戰爭 2.締造和平 3.建立新安全觀	1.戰略機遇期 2.和平必須持續 3.在和平當中尋求崛起與發展
軍事思想之指導與分析		1.人民戰爭 2.以劣勢裝備打敗優勢裝備	1.進行和平時期建軍 2.提升綜合國力為國防現代化奠基 3.走質量建军、精兵路線 4.積極防禦、現代化人民戰爭	1.提升綜合國力 2.高科技建軍 3.高科技條件下的積極防禦：護漁、護油	1.結合資訊、技術、人才與武器 2.軍事武力的非戰使用：護漁、護油 3.因應非傳統安全威脅
軍事戰略之理論構思		1.全面戰爭 2.早打、大打、打核子戰	1.積極防禦打局部戰爭 2.戰略防禦與攻勢作戰	1.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2.高技術作戰條件與現代化人民戰爭的有機結合	1.從軍事型態決定戰爭型態 2.首戰等於決戰 3.聯合作戰

戰役戰術戰法之研練與例證	1.十六字方針 2.十大原則 3.誘敵深入：運動戰、殲滅戰 4.有限核武、戰略嚇阻	1.軍事威懾與嚇阻－低度核武與戰略導彈 2.快速反應戰法－空地一體、協同作戰 3.三打三防	1.軍事威懾與嚇阻－中度核武與戰略、戰術導彈 2.研擬軍事革命戰術戰法 3.超限戰	1.科技練兵 2.軍事演習、軍事外交 3.加強聯合作戰、信息作戰、新三打三防、和新裝備訓練

表一係修改自：褚漢生，〈從解放軍戰爭思想的轉變探討中共「新軍事革命」的具體實踐〉，《海軍學術月刊》，第36卷第10期（2002年10月），頁19-30。其中胡錦濤時期為作者所加入。

二、地緣戰略觀與戰略文化的建構

地緣戰略通常被視為等同於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當代地緣政治學者將研究重心置於大國，並假設這些國家傾向擴展其疆界，以確保該國的自然資源以及邊界之安全。⁶⁶所以，地緣政治學的範疇主要牽涉到國家力量與空間的辯證互動關係，其意義在於提供決策者估量一國本身與其敵人（假想敵人）國力的途徑，用以規劃出國家軍事戰略與預測對方在戰時將採取軍事行動的方法，更進一步，從地緣政治尋得解決政策與戰略上的問題。⁶⁷因此，地緣戰略之功用在於解釋一國的問題與潛力，以及對於其國內政策乃至於外交政策或軍事政策提供一種指導與計畫。地緣戰略觀主要包含領導人的地緣戰略觀以及中國本身的軍事地理。

（一）毛時期兩強對峙下的反霸戰略

中共自1949年由毛澤東建政以來，從早期的聯蘇到抗蘇，以及反美到聯美的外交變動過程，致使毛澤東建構的國際地緣戰略遂由1950年代的「一邊倒」政策，轉向1960年代以後的「一條線、一大片」戰略軸線上發展。毛澤東所設定此地緣戰略，旨在對抗蘇聯霸權主義在全球之擴張，他主張應

⁶⁶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7.

⁶⁷ Gray, "Geography and Grand Strategy," p. 312.

該建立一條由日本到歐洲的戰略軸線（一條線），再到澳洲、紐西蘭，最後到美國的聯合戰線，並團結周圍國家（一大片），共同遏制蘇聯的擴張主義，在實質上，這就是「聯合反霸」的統一戰線。⁶⁸

同時，毛澤東為在發展中國家稱霸，遂又提出完整的「中間地帶」與「三個世界觀」，把全球劃分為第一世界—美蘇兩霸；第二世界—西歐、日本等次等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第三世界—泛指發展中的國家。毛澤東並以中國仍處於發展之中，在衡量自身的國力、人口、領土的大小後，認為連結發展中國家的統一戰線為基本倚靠力量。⁶⁹

換句話說，毛澤東的地緣戰略觀是建構在「以蘇畫線」的基礎上。中共為能與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建立「聯合反霸」的戰略關係，俾能有效遏制蘇聯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政策，他所提出的地緣戰略幾乎都未脫離對蘇聯畫線的戰略思考，並且以「制衡」的理念跟蘇聯在第三世界爭取廣泛支持。⁷⁰毛澤東此一國際反霸戰線，主要為：團結和依靠第三世界，聯合第二世界和美國，集中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最終目的就是要遏制蘇聯霸權的對外擴張，推遲世界大戰爆發的時間，爭取盡可能長時間的世界和平，實現中共推行現代化建設之目標。⁷¹

（二）鄧時期和解架構下的等距戰略

1980 年代鄧小平主政後，即翻轉毛澤東過度反蘇之地緣戰略觀。1982 年時他明確的提出：「不能只反對蘇聯霸權而丟掉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旗幟，對第三世界的正義鬥爭和合理要求要旗幟鮮明的支持。」⁷²因此，從 1982 年下半年起，中共在對外政策上就不再提及「三個世界觀」，取而代之的是，中共更強調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強調發展與第三世界的關係，美國也不被列入反霸的統一戰線範圍內。

⁶⁸ 宮力主編，《鄧小平的外交思想與實踐》，（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56。

⁶⁹ 金正昆，《現代外交學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69。

⁷⁰ 宮力主編，《鄧小平的外交思想與實踐》，頁 59。

⁷¹ 宮力主編，《鄧小平的外交思想與實踐》，頁 203。

⁷² 宮力主編，《鄧小平的外交思想與實踐》，頁 56。

也就是說，比較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國際戰略，其相同點都是從地緣戰略出發。由於毛澤東有「三個世界觀」的認知，中共的國際地緣戰略在冷戰時期，一直是以三分天下做為板塊分割的指標。在美蘇兩強爭霸的國際環境裡，當綜合國力無法與兩強對比，只好採取合縱連橫的戰術，達成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總體戰略目標。

而 1980 年代以後鄧小平則從現實主義出發，希冀營造「和平與發展」之周邊環境以進行改革開放政策，因此採取跟美蘇等距的外交政策，構成一個堅持反霸、不結盟、不搞對抗的國際地緣戰略。1990 年代初期，由於蘇聯、東歐共產集團相繼解體，中共又處於六四事件後被國際孤立的氛圍裡，所以當時的國際戰略仍消極的採取鄧小平所指示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思維，以度過國際對中共進行「新圍堵」的浪潮。⁷³

(二) 江時期後冷戰架構下的大國接觸

1990 年代中期以後，中共面對國際地緣板塊變化，美國在經過波灣戰爭以後，已經實質的變成單一超強，世界板塊也變成一個「一超多強」的多格局環境，中共也因改革開放累積綜合國力後提升自信。因為江澤民為實現「大國戰略」的戰略構想，⁷⁴他的國際地緣戰略隨著板塊的重新組合，而不僅僅站在第三世界或者是發展中國家立場來看世界，而是積極與大國之間尋求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並透過各種高層的互訪，讓中國擠進大國的互動之中，進一步參與各項國際建制與融入國際社會之中。

因此，如果說毛的國際地緣戰略是立足在第三世界，並與美蘇兩強進行「和戰」的兩手策略，那鄧小平的國際地緣戰略則是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

⁷³ 楊成緒，〈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鄧小平外交思想淺議〉，《光明日報》（上海），2004 年 8 月 9 日，版 1。

⁷⁴ 江澤民時代所提出的「大國戰略」，其主要目標被視為是「站在戰略的制高點上，建立平等、全方位、多層次、多樣化的合作關係新模式。它是以經濟與科技合作為重點，不斷擴大經貿、科技合作與金融等領域的合作，求得共同發展、共同防範國際風險」。相對的，由於大國利益相互交匯、相互牽制，以形成密切的大國關係網絡，大國都實行全方位外交，任何兩方關係的變動，都會涉及其他大國的切身利益，有關各方也會做出反應，相應調整彼此的關係，以維持多邊協調和平衡的總體格局。參閱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日、歐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 8-9。

場，對外採取「被動」的戰略。相對於毛、鄧，江澤民則是周旋於美國超強的周邊，突破美國與各國的戰略圍堵，逐步侵蝕美國的超強地位。這種「主動」的戰略方針，打破過去中共不稱霸的傳統，也不再跟第三世界國家「以和為貴」，而以「棍棒與紅蘿蔔」的「新霸權」姿態逐步出現於國際社會。

所以，本質上江澤民的國際戰略雖然仍聲稱是堅持「獨立自主、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建立國際政經新秩序」的毛、鄧外交哲學，但實質上江要比毛、鄧的作為積極進取得多。由於江澤民的強勢作為，因此，其所建構之國際地緣戰略所依據為：立足於東亞，依託在亞洲大環境的和平與發展，再聯合環太平洋經濟圈的政經實力，縱橫於美洲與歐洲，幫助第三世界的大崛起，打破美、歐壟斷全球、獨霸全球的戰略構想。為此，亞洲—太平洋既是後冷戰時期的全球戰略中樞，也是中共擴展全球地緣戰略的基點。⁷⁵

這個全球地緣戰略，正如北京清華大學教授楚樹龍所分析，國際地緣戰略設計即採取：(一) 亞洲地區戰略—從雙邊到區域合作及一體化戰略；(二) 美歐俄戰略—伙伴和對手的選擇；(三) 中東、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戰略—應採取發展外交。他認為在這樣的戰略設計上，中共還需配合多邊外交的戰略，如此可以讓中共通過國際體系內努力，逐漸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促進實現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則、主張和理想。⁷⁶

另外在地理層次的意義上，美國海軍戰略學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認為，「歷史已經注定，一個一方鄰接陸疆的大陸國家，將無法在海軍發展上與海島國家競逐。」在軍事地理學中，海陸度是一個分析的概念，用來描述一個國家是海洋國家亦或者為大陸國家的程度分析值。中國雖然瀕臨太平洋且具有漫長的海岸線，但是漢民族長期以來活動範圍在陸地而不是在海洋。因此，中國長期以來主要為陸權國家（land power）而非海權國家（sea power），中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他必須承擔內陸和海洋兩方面的防禦，然而所有大陸國家都必須加強在陸疆上對於鄰國的防禦，必然不能所有資源發展海

⁷⁵ 王崑義，〈中共的國際戰略與臺灣的外交選擇〉，《國家政策（動態分析）雙週刊》，第 156 期（1997 年 1 月 21 日），頁 31-32。

⁷⁶ 楚樹龍，〈全面建設小康時期的中國外交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3 年 8 月，總第 276 期，頁 11-13。

洋力量，很難同時成為陸權與海權並重的國家。⁷⁷

於是說，中共現階段希冀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夥伴關係，除瞭解到美國的霸權架構以及中國地理限制的不可逆轉外，還因為中共經濟發展所欠缺的資源，需要倚靠周邊國家或地區的穩定供給，因此，中共的地緣戰略除了預防衝突之外，更已包含非傳統安全的因素，也強調與周邊國家共同管理非傳統安全之威脅。

三、領導人的戰爭觀與戰略文化建構

就和其他學科一樣，領導人戰爭觀自有其傳承。中共建國後戰爭觀的形成與演變，大略上可以分為：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時期、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以及波斯灣戰爭之後所謂的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時期。每個時期由於領導者的風格不同，來自國內外的威脅程度以及各時期技術發展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事實上，「戰爭觀」是人們對於戰爭的起源與內涵所出現的一種認識，由此認識所引發的對戰爭的規律性、手段與目的的連鎖性等的看法，都是構成人們對整個戰爭的一種認知。例如，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認定：「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鬥爭形式。」⁷⁸這句話就構成中共戰爭觀最傳統的一種定義內容。

中共軍事戰略思想可以分為三派：傳統主義者（traditionalist）、新傳統主義者（neo-traditionalist）、軍事革命論者（military revolutionist）。傳統主義者服膺於毛澤東人民戰爭的理念，強調主動防禦的戰略準則，「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新傳統主義者則認為至少在周邊區域的

⁷⁷ 戴逸與張世明，《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軍事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頁195-196。

⁷⁸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頁168。

層次上，解放軍需保有兵力投射的基本能力，如快速反應部隊的成立與海權的擴張則是基於這樣的觀念；軍事革命論者視未來為一種快速改變的時代，解放軍要抓緊這波軍事事務革命的先進技術。⁷⁹

（一）傳統主義論者的人民戰爭

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想，是以「人民」作為戰爭的主體。毛澤東就提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因此，他主張應全心全意地為人民，並充分動員、組織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戰爭。要進行革命戰爭，就必須發動、組織和武裝人民群眾。⁸⁰「戰爭的偉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也就是，革命戰爭如果離開人民群眾，那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也就失去進行革命戰爭的物質基礎。⁸¹

何謂「人民戰爭」？「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中就說：「人民戰爭，是被壓迫階級或被壓迫民族為謀求自身解放，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所進行的戰爭。」⁸²該定義隱含著三層意義：一、人民戰爭的性質；必須是以廣大人民群眾為主體的正義戰爭才是人民戰爭。二、人民戰爭的形式；它是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所進行的全面戰爭形式。三、體現人民戰爭的思想；它包含著各種正規戰、游擊戰以及政治、經濟等不同層面上的鬥爭。⁸³可以說，人民戰爭是一種動態過程，它是毛澤東在不同的時期，因地制宜的發展出來的一種戰爭思想與模式。

傳統主義者仍源自於馬列毛主義思想，如恩格斯理論中就論述軍隊為要贏得戰爭的勝利，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槍。⁸⁴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基本組成包括：人民軍隊、人民戰爭以及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首先，人民軍隊的主要內容包含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絕對的領導，人民軍隊是一個戰鬥隊，也是工作

⁷⁹ Charles F. Hawkins, "The Four Futures: Competing Schools of Military Thought inside the PLA," March 2000[Online], Http: <http://taiwansecurity.org/IS/IS-0300-Hawkins.htm> (text accessed 5 July 2000).

⁸⁰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頁 980。

⁸¹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 478。

⁸² 《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頁 876。

⁸³ 岳嵐，《高技術戰爭與現代軍事哲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頁 380。

⁸⁴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治工作教研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基本問題》(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36。

隊與生產隊。其次，人民戰爭也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並實行主力軍團、地方兵團與游擊隊和民兵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同時在農村建立革命的根據地，最後創造出一套以人民戰爭為基礎，並與當時條件相結合的戰略戰術。最後，人民戰爭的戰略與戰術包含：把作戰目的與作戰手段實施辯證，堅持積極防禦反對消極防禦，採取適當的作戰方式，⁸⁵並把運動戰、陣地戰與游擊戰交相結合運用。

（二）新傳統主義論者的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

當國防現代化在 1973 年時被引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概念時，解放軍的軍事戰略產生兩項重要的轉變。首先，在 1970 年代末時，人民戰爭的概念逐漸被「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所取代。因為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所強調的是贏得戰爭的方式，而不只是人民戰爭所需要面對的戰爭型態。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所強調的是在邊境上就擊敗敵人的有限戰爭，以先進的技術與聯合作戰兵種，在短時間內就贏得戰爭勝利的關鍵，同時新傳統主義也認同兵力投射之觀念，也就是把解放軍送到中共國境之外的能力，但這目的是區域性的並非是全球性。⁸⁶

1980 年代中期以後，鄧小平並未放棄「人民戰爭」的想法，但為適應不斷發展的軍事新形式，先後提出「三個轉變」：一是在國防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上，從「早打、大打、打核戰」的臨戰狀態，轉到和平時期建設軌道上來；二是在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上，從應付一般條件下的常規戰爭，轉到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三是在軍隊改革和建設的指導方針上，從數量規模型、人力密集型，轉到質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的發展。⁸⁷也就是中共從過去準備打全面性戰爭，轉移到打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將「人民戰爭賦予新的意義，並結合軍事事務革命觀念的興起，成為

⁸⁵ 張志學編，《中華小百科全書》，軍事學卷（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5-8。

⁸⁶ See Michael Pillsbury,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0)[Online], also available on Internet, Http: <http://www.ndu.edu/inss/books/pill2.htm>.

⁸⁷ 劉興祥，〈中共對高技術戰爭的認知界定與理論發展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7 卷第 5 期，2001 年 5 月，頁 95。

「新人民戰爭」觀。

新傳統主義的軍事思想主要是希望不用放棄重要的經濟與工業建設的前提下，防範其他外部威脅對中國大陸的攻擊行動，它將陣地戰（positional warfare）、聯合兵種戰術（combined arms tactics）以及運用正規與機械化部隊，在敵人可能進入中共領土之前讓其行動受阻，這種的方式讓首戰即等於決戰，衝突初期的階段就變得相當重要。⁸⁸

新傳統主義建軍路線的最大特色就是加強軍隊現代化、正規化與機動性的發展。其中尤其重視軍隊在高科技條件下的作戰能力。在這種的指導方針之下，人民戰爭、民兵與一般群眾的作用大幅縮減，⁸⁹同時也合併大軍區、撤銷許多軍、師級單位，成立集團軍、實行軍政文民整體化訓練，進行軍事幹部的檢討，恢復學生軍訓、國防科技研發和走向「軍轉民」的方向等。⁹⁰

（三）軍事革命論者的高技術局部戰爭

1990 年代以後，中共之所以會強調「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一般認為是受到西方在 20 世紀 80 年代所興起的「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的觀念所影響。當時，西方所稱的「軍事事務革命」是「指科技、組織、戰術、社會、政治與經濟等用以決定兵力發展、部署與戰鬥方式的重要因素發生變化，而對戰爭的本質造成根本改變的一種現象。」⁹¹也就是說，「軍事事務革命」所發生的原因是有其歷史背景存在，它是西方文化與社會發展的一部份。因此，它不僅是發生在軍事科技上的突破，而且還結合政治、經濟和科技的變化。由此延伸到軍事領域，它並包含軍事組織、武器裝備與訓練方式上的革命；另外，戰爭進行方式上的變革，也是一項重要的因素。⁹²

⁸⁸ Mark Burles and Abram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 (RAND, 2000, MR-1160-AF), 28-29.

⁸⁹ 俞雨霖，〈毛澤東人民戰爭路線再度回潮〉，《中國時報》，1996 年 1 月 10 日。

⁹⁰ 刑曉麗與曹建平，〈鄧小平的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中共)，第 39 卷 2 期 (1999 年 3 月)，頁 50。

⁹¹ Scott Maryott, *History of the Military Art* (New York :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1998), p. 98.

⁹² 翟文中與蔡裕明，〈兩次世界大戰潛艦作戰概念之演變：由軍事革命的觀點分析〉，《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10 期 (2005 年 4 月)，頁 135-156。

此種現象之發生，西方社會所設想的「軍事事務革命」其實更像托夫勒(Alvin Toffler)所言：「軍事事務革命，就其一般的意涵而言，只有在新文明挑戰舊文明或整個社會轉型時，迫使軍隊各階層隨之在科技、文化、組織、戰略、戰術、訓練、準則與後勤方面產生改變時才會發生。當這種改變發生時，軍事、經濟與社會的關係已經改變，全球的軍力平衡局勢已經被打破。」⁹³

⁹³ 參見《軍事事務革命》。

西方社會從社會、經濟的轉變所強調的「軍事事務革命」，解放軍在論述未來的戰爭模式時，卻只是強化「高技術」在未來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涉及到組織、社會和經濟方面的變動。所以，解放軍就把西方所進行的「軍事事務革命」等同於「高技術戰爭」這種強化技術決定論的戰爭法則，它是指「參戰各方或至少一方，大量的運用具資訊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航太技術、和海洋技術等當代高、新技術水平的常規武器裝備和與之相適應的作戰理論、作戰方法所進行的戰爭。」⁹⁴因此，本質上「高技術戰爭」被中共認為是一個相對、動態和發展中之概念，其主要特徵被設定在戰爭技術變革的領域，所以就出現以下四種面貌：⁹⁵

一、技術密集型；不論是高技術武器裝備本身的結構方面，還是對它所使用的手段方面，都具有技術密集型的特徵。

二、電子化、智慧化、數位化；一切高技術戰爭，無電子不能制導，無智能不能精確制導，無數位化就無法實施控制。

三、天地戰、天戰、高能戰；高技術戰爭與以往戰爭在戰爭型態上最顯著不同之處，就是航太武器用於戰爭，從而出現了天地戰和天戰的兩種作戰樣式。天地戰是實行空中、地面、海上渾然一體的立體戰爭。天戰是指在外層空間的偵察、預警和支援下，實施以航太武器為主的太空作戰。同時，高技術武器所蘊含的巨大能量和高技術戰爭的巨大消耗，又使高技術戰爭成為高能戰。

⁹³ Steven Metz and James Kievit, *Strategy and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From Theory to Policy*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1995), p. 101.

⁹⁴ 岳嵐，《高技術戰爭與現代軍事哲學》，頁8。

⁹⁵ 張召忠與周碧松，《明天我們安全嗎》，頁11。

四、結構一體化；它所實施的範圍將是陸、海、空、天、磁對抗的一體化，隨著軍事高技術之應用，作戰中各種空間與武器的運用將連結在一起，因此戰場將不再設定在一定的範圍裡。

從這些特徵來看，高技術武器裝備不在於它的「高」，而是在於表現它的技術附加價值高、技術含量高、軍事效益高，當然也包含著經濟投入高。因此，從高技術戰爭的物質基礎來看，高技術戰爭實質上就是一場「知識戰爭」。舉凡從戰場上的情報蒐集、傳遞、分析、處理、決策、指揮、控制、通信、武器、裝備、後勤保障等，均廣泛的使用到高技術，使得高技術所展現的「知識」價值，實質上已經掌控整個現代戰爭的一種「軍事革命」。⁹⁶

由於解放軍從技術層面的變革為「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思想的定調，1990年代以後，中共內部對於「人民戰爭」、「局部戰爭」和「軍事革命」的認知，在戰略文化上也出現不同的想定與影響（參閱表二）。

在於此，我們可以說，這就是「中國化」的「新儒學」。

⁹⁶ 王崑義，《全球化與台灣—陳水扁時代的主權、人權與安全》（臺北：創世文化出版社，2001），頁204-205。

(表二) 中共對高技術戰爭的戰略想定

傳統主義論者的人民戰爭之想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敵人--美、俄或日本等，這些國家將會入侵並征服中國大陸 * 此種戰爭將持續許多年 * 中共領導人需在戰爭期間遷移國都 * 中共的國防工業基礎，將會武裝數百萬民兵遂行長期作戰，直到正規部隊擊敗敵人為止
新傳統主義論的局部戰爭之想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局部戰爭中之敵人將為超級強國 * 戰爭將發生於中國大陸邊界附近 * 敵人不會揮兵深入中國大陸內部 * 中共將尋求迅速的軍事決定 * 中共的快速反應部隊將擊敗日本、越南、印度、中亞、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或印尼等國投入局部戰爭部隊
軍事革命的想定	<p>由於中共的敵國--可能是美國、俄羅斯或日本--將擁有先進武器、通信與偵察衛星、隱形飛機、核子武器、奈米科技 (nano-technology)因此中共必須：</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彌合其與先進國家之間的「資訊鴻溝」 * 將所有部隊進行網路化 * 攻擊敵人的 C⁴I，以癱瘓其作戰能力 * 對敵人採行先制攻擊 * 使用導能武器 * 使用電腦病毒 * 使用潛射彈藥 * 使用反衛星武器 * 派兵阻止敵人建立戰場後勤能力 * 採行特戰突擊

資料來源：由作者修正自 Michael Pillsbury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中共對未來安全環境的辯論》，(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頁 317-320。

從上述的表格中所呈現的意義，雖然在「打贏高技術戰爭」的方法上，中共幾乎是把發展資訊戰，當成是當前發展高技術戰爭中主要的對象。但也因過度強調高技術在戰爭中的價值，強調知識戰爭將成為未來戰爭的主要形式，為因應「軍事事務革命」對未來戰爭行為的改變，中共就不斷的增加國防經費，並把它用來取得高科技武器為目標。當然，也因受到「技術決定論」的影響，使得中共軍事專家也呈現對西方科技盲目崇拜的特性，但它能否與解放軍真實的作戰能力相配合，卻是頗值得懷疑。

肆、中共的戰略文化與軍事演習

由於中共的戰略文化是建立在領導人的世界觀、地緣戰略觀與戰爭觀的基礎上，在時移勢轉、與時俱進的情況下，致使中共從建政以來所進行軍事演習，都呈現各種不同的面貌。

一、中共軍事演習的推展與轉變

中共從建政以來一般所進行的軍事演習，大致又可分為幾個階段，在1950年代之軍演主要是為掌握新技術，學習聯合作戰的技能。1960年代轉向小而精、短而少的演習方式，特別是針對蘇聯核子部隊可能入侵的情況下，解放軍的重點演習大多在甘肅的河西走廊進行。1970年代所推出的「三打三防」，把「打坦克、打飛機、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學、防生化武器」作為當時的演習重點。1980年代的軍演則著重在協同作戰、快速反應、電子對抗、後勤保障、野戰生存等五種作戰能力的演練。

從1993年提出「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以後，中共的軍事演習也隨著新軍事變革而產生轉變。例如1998年9月解放軍曾在東北遼陽進行一次「全軍運用高技術知識普及深化訓練改革成果」的集訓。該集訓明確軍事訓練面向新世紀發展的科技興訓戰略思路，提出要把決定軍隊戰鬥力水平高低的技術素質訓練作為軍事訓練的核

心要素，把基地訓練、模擬訓練、網路訓練等先進手段作為軍事演練的新形勢。此後，中共各地軍隊就掀起科技大練兵浪潮。

事實上，解放軍在 1990 年代末期所興起的科技大練兵的浪潮，包括有空襲與反空襲，電子干擾與反電子干擾，制資訊權與反制資訊權，聯合與反聯合，機動與反機動等在現代高技術戰爭中常見又非常關鍵的問題，都是解放軍一直在廣泛開展的科技練兵的內容。為配合科技練兵的要求，解放軍也提出不少新的戰法，其中一個突出內容就是「新三打三防」：打隱形飛機、打巡航導彈、打直升機；防電子干擾、防精確打擊、防偵察監視。從九一一事件以後，中共為配合反恐之需要，也不斷跟各國進行反恐相關之聯合演習，以作為「軍事外交」的一部份。

由這些軍事演習的發展來看，解放軍的軍演也發生幾項重大的轉變：

第一、從空降、登陸的軍事演習，向全面性的陸海空軍間之聯合作戰演習轉變：解放軍希望通過海陸空軍之間的聯合演習，可提升解放軍的合成、快速作戰能力，包括指揮官多兵種的統合指揮能力。例如 2004 年年初，廣州軍區陸軍、空軍配合南海艦隊在湛江地區進行海空聯合大演習。2004 年九月份的「東海四號」演習科目為三軍聯合登陸。北京軍區在 2004 年 4 月上旬所進行的實兵對抗演習，也出現陸軍航空兵、裝甲兵師和水陸坦克師。陸海空的聯合作戰是現代較具規模的戰爭的必然形態，此為解放軍近年所戮力追求之目標，也是未來解放軍軍事演習最常出現的形式。

第二、從單一軍區向大軍區之間的對抗演習轉變：大軍區之間的對抗演習使軍事演習難度增加，同時增加實戰感，亦有利於未來在戰爭中大軍區進行合作。2004 年 4 月中旬，濟南軍區與南京軍區舉行跨省對抗演習，雙方出動地對空導彈團、空降旅及機械化師。同月下旬廣州軍區和成都軍區在貴州銅仁地區錦江、沅江下游進行陸空聯合攻防演習。成都軍區出動兩個機械化師、舟橋團及空軍殲擊師；廣州軍區則出動兩個摩托化步兵師、空軍強擊轟炸團，雙方進行對抗演習，這些都使解放軍演習的規模更加擴大化。

第三、軍事演習的區域有從內地向沿海地區轉換。例如 2004 年所舉行的軍事演習，參加演習部隊主要包括南京軍區、廣州軍區、濟南軍區、東海

艦隊和東海艦隊等。演習場地多在沿海地區的另一個意義，是反映解放軍整體戰略的改變。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的整個經濟重心在內地地區，也就是所謂的「三線戰略」，為配合這一目標，解放軍的屯兵練武亦都在中國大陸偏僻地區舉行。而鄧小平時代改變經濟發展以沿海地區作為主要的區域，於是「三線」企業萎縮，甚至遷向中心城市、沿海地區。⁹⁷解放軍的戰略佈局也隨之改變，重點放在沿海地點，並將未來的主戰場設想在沿海地區之外的海域。這也是解放軍戰略最重要的改變。

第四、非傳統安全需要。當前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威脅，逐漸影響國家安全，於是共同的國家希冀透過聯合軍事演練來打擊相關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以及國家間的緊急救難。

二、中共軍事演習之模式

解放軍的軍演除了上述三種轉變之外，隨著國際環境的轉變，解放軍的軍事演習也呈現三種類型進行演練：一是單邊主義模式的軍事演習，二是雙邊主義模式的軍事演習，三是多邊主義模式的軍事演習。

(一) 單邊主義模式的軍事演習

「單邊主義模式的軍事演習」是由中共解放軍自行進行的軍演，它的意義主要有威懾和實戰作用，有時也會有交流與展示武力的作用存在，其目的端看領導人當時的世界觀、地緣戰略觀與戰爭觀為何來決定。

例如，在毛澤東推行「一邊倒」的時代，一方面為「要為打台灣創造條件」，所以不時的進行「有限的軍事行動」，諸如軍事演習、威脅海峽通道、對台灣周邊水域干擾、甚至對沿海島嶼進行小規模軍事行動，以顯示威懾力量，除對臺灣施加壓力之外，也牽制美國不敢對中共開戰。⁹⁸

在「一條線」的時代，由於毛澤東「以蘇畫線」把中共對蘇聯的決戰點

⁹⁷ 何頻，〈解放軍演習被忽視的意義〉，參閱 <http://bjzc.org/bjs/bc/19/51>。

⁹⁸ 楊勝群與田松年主編，《共和國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1949-196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 301-303。

設定在河西走廊，所以許多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被轉移到該地，特別是為「打核戰」，解放軍加重對防核生化的演習項目，並配合「三線戰略」所發展出來的「兩彈一星」，中共的軍演提升到核子演練。

江澤民時代以後，台獨問題變成是中共最急迫需要面對的議題，江澤民於是改變毛澤東的政策，改為「聯美促統」、「聯美反獨」的戰略。⁹⁹另外從1995年到1996年對台所進行的飛彈試射演習，解放軍開始把軍事演習作為威懾台獨的手段。由於中共在該次的演習中取得台海更大的戰略空間，於是，就開始順勢把軍事演習的目標擴大為攻台的戰爭準備。美國海軍情報處（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的評估報告就發現，1996年後中共的戰術作為均在前進指揮所演習完成，並展開四階段的軍事演練，第一階段為戰略打擊演習，第二階段為奪取制空權演習，第三階段為奪取制海權演習，第四階段為兩棲登陸作戰演習。¹⁰⁰因此，中共的軍演從對台武嚇到作為對台軍事行動的演練，實質上已把過去演習的觀念和戰爭的目標進行轉變，它對台更具威脅性、實戰性，已讓兩岸隨時處於戰爭的邊緣。

就因中共對台的軍事演習有這樣實戰性的轉變，2004年解放軍在東山島的軍演，就有走向「實戰制度化」的效用。該次參加軍演的部隊包括海、陸、空和二炮部隊，演練的項目包括戰術與戰略導彈攻擊、封鎖與反封鎖、搶灘登陸與反登陸、空襲與反空襲、空降、電子干擾與反干擾、衛星偵察與跟蹤、征集民船、跨區調兵以及打航母、打隱形戰機、打巡航導彈、打直升機、防精確打擊、防偵察監視、「圍戰打援」、分向目標奪取及戰場掃蕩與鞏固等，都是對台極具針對性的實戰項目。

而該次軍演所使用的先進武器包括有：蘇愷27戰鬥機、FBC-1飛豹中程戰鬥轟炸機、直-9武裝直昇機、現代級戰艦、基洛級潛艇、東風-十五戰術彈道飛彈等。中共軍事專家就指出，解放軍在東山島進行的演習必須達到如下效果：如果台灣發生台獨突變，大陸方面應能立即採取有效的軍事行動；

⁹⁹ 李小兵，〈北京對台兩手策略的由來與特點〉，《當代中國研究》（北京），1995年，第6期，總第51期。另參閱 <http://www.chinayi.net/StubArticle.asp?issue=950603&total=51#b1>。

¹⁰⁰ 《中國時報》，1999年10月11日，版2。

而一旦台海爆發衝突，通過三軍聯合作戰應能全面奪取制空權和制海權，並阻止外國軍事力量介入。¹⁰¹

因此 2004 年解放軍在東山島的軍演實質上所設定的目的則有：

一、爭奪台海的制空權；該次演習與歷次軍演以搶灘登陸為主不同，其主要的目標首次鎖定在爭奪台海制空權上。中共軍事專家就指出，此次軍演充分體現「空權至上」的現代戰爭思想。中共軍事科學院的軍事戰略專家彭光謙也指出，現代局部戰爭，將主要在空中、海上展開，制空權、制海權當然首當其衝。它不是爭奪不爭奪的問題，而是必須要得到。因此，一般中共軍事專家均視為東山島的演習是為爭奪台海制空權。¹⁰²

二、威嚇敵對力量；中共軍事專家也認為，在中共的國家利益和安全已與以往大不相同的新背景下，「戰略威懾」已變得更為重要，而戰略威懾的方式及所要達成的效果也需作出新的調整規劃。其中最大的轉變，應是不能繼續保守在基於傳統領土安全的戰略威懾，而是要在此基礎上，更加注重基於安全邊界的戰略威懾。特別是在如何維護海外合法權益的問題上，中共要利用非戰爭性質的武力行為，對外告訴中共的國家利益所在，以及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之決心意志，以免中共的國家利益與安全繼續受到侵害。¹⁰³因此，東山島的軍演已經把威嚇台獨之目的，再推進對其他敵對勢力進行威嚇的作用。

而 2005 年中共軍演的特點就是朝向北方與內陸轉進。以解放軍南京軍區兩棲登陸演習多在福建東山島和晉江附近實施。而 2005 年南京軍區兩棲登陸演習則改在浙江舟山群島實施，由海軍陸戰隊負責。而在廣州軍區方面，過去側重兩棲登陸作戰，而 2005 年則重視在廣州附近的城鎮戰。因此未來解放軍可能的兩棲登陸作戰，除南海艦隊的兩支海軍陸戰旅外，陸軍南京

¹⁰¹ 〈中國本月在東山島舉行三軍聯合軍演〉，參閱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_taiwan/pages6/taiwan050704.html。

¹⁰² 〈解放軍攻臺料「島內決戰、島外決勝」〉，參閱 http://news.1chinastar.com/ll_fanti/1320712.shtml。

¹⁰³ 〈中國軍演的戰略威懾意義〉，參閱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4-07/31/content_1685823.htm。

軍區的第一集團軍和廣州軍區第四十二集團軍的兩棲機械化師將執行兩棲登陸任務，而由廣州軍區擔負陸上的城鎮作戰。¹⁰⁴因此在 2005 年 9 月 21 日在廣東軍區陽江的軍演，包含防空、奪取制空權、海上封鎖與兩棲登陸等演習科目。¹⁰⁵

另外，中共於 2005 年 9 月於北京軍區管轄的蒙古朱日和合同戰術訓練基地舉行代號為「北劍 2005」(North Sword 2005) 的裝甲師對抗的軍事演習。該演習當中除日本未獲邀外，邀請美、俄、英、德等二十四國軍事觀察員。中共從 1949 年就以建立坦克師，分散配屬步兵作戰，而投入戰場最大的建制為坦克連，早期的坦克師並不具備獨力作戰和整體突擊的能力。¹⁰⁶此舉也對外顯示中共軍隊開放透明。

中共軍事科學院彭光謙則表示，該項演習「已經實現由基於威脅向基於能力的轉變」。其中「基於能力」是指軍隊的建設與訓練，旨在提高訓練水準和作戰能力，而非針對某一國家或集團。「基於威脅」則是著眼於明確的假想敵。¹⁰⁷換句話說，「北劍-2005」軍演顯現中共戰略環境的轉變，讓解放軍調整演習的針對性，而「東山島」軍演更標誌著軍演的針對性，也就是對於台灣而言，強調主權與威懾之戰略。

(二) 雙邊主義模式的軍事演習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社會不斷的出現軍事力量的新中心，雙邊主義模式的軍事演習是因應這種軍事力量的新中心的出現，以強化兩國之間的聯繫關係，它也是作為軍事外交 (military diplomacy) 的一種補充，更是兩國建立軍事秩序的指標。Kenneth W. Allen 與 Eric A. McVadon 就把「軍事外交」分為七大項目，如軍事磋商機制、軍事高層官員互訪、軍事人員交流、技術合作、武器出售、軍備管制協商、以及維持和平活動 (PKO)。¹⁰⁸其中在功能

¹⁰⁴ 《自由時報》，〈中國軍演，朝北方及內陸轉進〉，2005 年 9 月 23 日，版 3。

¹⁰⁵ 《文匯報》，〈陽江軍演，176 個航班取消〉，2005 年 9 月 22 日，版 6；《聯合報》，〈海陵島，大規模軍演〉，2005 年 9 月 23 日，版 4。

¹⁰⁶ 《聯合報》，〈北劍軍演，裝甲師對抗，史上規模最大〉，2005 年 9 月 28 日，版 13。

¹⁰⁷ 《中央日報》，〈北劍 16000 共軍演習，24 國觀摩〉，2005 年 9 月 28 日，版 6。

¹⁰⁸ Kenneth W. Allen and Eric A. McVadon, *China'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Oct. 1999).

交換當中，還包含雙邊在操作、後勤、訓練、參與國際會議、教育課程互換、語言訓練等討論，而雙邊的軍事演習更是作為軍事外交最重要的項目之一。

為與各國進行「軍事外交」之目的，從 2002 年以來，中共軍隊開始有選擇性地逐步參與跟各國舉行雙邊的聯合軍事演習，以擴展中共與相關國家安全合作之領域。解放軍除與多個國家軍隊聯合舉行不同內容的軍事演習之外，並常邀請外軍觀摩。以下為近幾年來解放軍數次與外國軍隊舉行的聯合演習、邀請外國軍方人員觀摩的軍事演習及相關訓練活動（參見表三）。

另外，中共與俄羅斯兩國海軍在 2005 年 8 月也在山東半島與黃海海域舉行代號「和平使命-2005」(Peace Mission-2005) 的聯合軍演，演習之內容包含海上封鎖 (naval blockade)、兩棲登陸 (amphibious landing) 與強制隔離作戰 (isolation drill)。¹⁰⁹此次演習雙方在俄羅斯進行長達半年的協調論證，之後才在遼東半島進行實兵演練。俄太平洋艦隊司令表示，中俄海軍演習部分可以檢驗雙方各個作戰環節的快速聯動戰鬥水準，演習中將雙方統一計劃、分獲資訊、獨立式行動等合同戰鬥模式，轉變為統一計劃、共用資訊、融合式行動的新型合同戰鬥模式。此外，兩軍可以在機動突擊與情報、決策和火力之間建立快速聯動的行動模式。¹¹⁰

¹⁰⁹ 《中國時報》，〈軍演閉幕，強制隔離，部隊深入擊潰敵陣〉，2005 年 8 月 26 日，版 13。

¹¹⁰ Elizabeth Wishnick 著，〈中俄聯合軍演同床異夢〉，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617&Itemid=47

(表三) 解放軍近年來與其他國家進行重大聯合軍事演習一覽表

時間	演習國家	說明
2002 年 10 月 10-11 日	中吉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中共與吉爾吉斯斯坦在兩國邊境地區舉行聯合反恐軍事演習。此為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部中吉兩國首次舉行之雙邊聯合軍事演習，也為中共軍隊第一次與外國軍隊聯合舉行實兵演習，也是中共解放軍歷史上第一次出境演習。
2003 年 10 月 22 日	中巴海軍聯合海上搜救演習	中共海軍與巴基斯坦海軍在上海附近的東海海域舉行代號為「海豚 0310」的聯合搜救演習，此為中共海軍首次與外國海軍進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聯合演習。
2003 年 11 月 14 日	中印海軍聯合海上搜救演習	中共海軍與印度海軍在上海附近的東海海域進行代號為「海豚 0311」的聯合搜救演習，這是中共海軍首次與印度海軍進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聯合演習。
2004 年 3 月 16 日	中法海軍聯合軍事演習	中共海軍與法國海軍在青島附近的外海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在該演習中，兩國海軍進行海上直升機互降。
2004 年 6 月 20 日	中英海軍聯合搜救演習	中共海軍與英國海軍在青島附近的黃海海域進行聯合海上搜救演習。此為中共海軍與英國海軍舉行的第一次聯合演習，並且首次邀請美國、法國、德國等 15 個國家的 15 名駐華海軍武官在「哈爾濱號」上全程觀摩演習。
2004 年 8 月 6 日	中巴聯合反恐軍事演習	中共解放軍與巴基斯坦武裝部隊在新疆帕米爾高原的中巴邊境地區舉行代號為「友誼—2004」的聯合反恐軍事演習。此為兩國軍隊的首次聯合反恐軍演。
2004 年 8 月 28 日	中印聯合登山訓練	中共解放軍邊防部隊和印度軍隊邊防部隊在西藏自治區普蘭縣境內舉行聯合登山訓練活動。此為兩軍邊防部隊首次在邊境地區舉行聯合登山訓練。

2004 年 10 月 14 日	中澳海軍聯合搜救演習	中共海軍和澳洲海軍在青島附近的黃海海域舉行聯合搜救演習，此為兩國海軍首次進行的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聯合演習。
2005 年 8 月 18 日	中俄聯合軍事演習	中共與俄羅斯舉行「和平使命－2005」聯合軍演。演習地域跨越兩國陸、海、空域，演習的內容則涵蓋對主要挑戰的新作戰樣式和作戰行動。
2006 年 8 月 24-26 日	中哈聯合反恐演習	中國和哈薩克在新疆伊寧舉行「天山一號」聯合反恐軍演。

資料來源：由作者修正自〈中國近兩年來的重大軍事演習一覽〉，參閱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junshi/668177.htm>。

(三) 多邊主義模式的軍事演習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擴展，全球公共議題的共同管理已經是各國感覺日益迫切的事。特別是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後，恐怖主義的問題更被各國列為必須透過軍事權力進行地緣治理的主要項目。恐怖主義的行為、預防與消除，也變成是全球不斷透過多邊主義模式的軍事演習尋求解決的主要方法之一。畢竟，恐怖主義所造成的安全議題，已經不僅僅是依照國家地理疆界的防禦來進行定義，而需要依據集體防禦和國際安全的內涵來加以確定。¹¹¹

自 20 世紀的 90 年代以來的制度外交中，中共雖著力於建構自己周邊制度性的合作網絡，但因特殊的地理因素，中共與周邊國家在解決共同的議題上，仍然隱藏著許多複雜利益糾葛關係存在，尤其是涉及到區域發展、打擊跨國犯罪、打擊恐怖主義、合作安全等公共議題的不斷產生，中共必須建立一個更廣泛交往的制度性架構，因此，從雙邊主義的聯合軍事演習，到多邊主義的聯合軍演，變成是中共建構「和平發展」的一個要項。

事實上，透過多邊制度軍事外交架構的建立，它可以制約自己，也可以用他來制約別的國家。與雙邊制度相比，多邊制度的軍事外交可以擴展更多

¹¹¹ 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等著，楊雪東等譯，《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175-176。

的外交行動空間，也可以讓一國在國際關係中被社會化，學會用規則來保護自己，並用規則來合法的去追求更多的利益。¹¹²運用在軍事外交上，各國更可以在建立軍事權力的地緣治理上，獲取更可以被信賴、容易被預期、並且是負責任的信任機制，避免在周邊國家之間產生不必要的誤解。

為此目的，2003年8月6日至12日，中共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舉行多邊聯合反恐軍事演習。這是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以來首次舉行的多邊跨國聯合反恐軍事演習。在演習中，中共、哈薩克、吉爾吉斯、俄羅斯、塔吉克等五國軍隊聯合指揮、共同行動，通過反恐演習相互學習，加深瞭解，並實際加強相互間協調與合作機制。

這次代號為「聯合—2003」的多國軍演分兩個階段，先後在哈薩克東部邊境烏恰拉爾市和中國新疆的伊犁地區舉行。演習的假設是：國際恐怖分子在某國劫持客機、扣押人質，並侵犯哈薩克領空；同時另一國際恐怖分子秘密潛入中國新疆伊犁，建立武裝營地，伺機製造恐怖暴力事件。在演習過程中，各參演國指揮參謀人員和部隊進行聯合指揮部室內演練以及城鎮清剿、解救人質和攻打恐怖分子營地，並聯合圍殲恐怖分子的實兵實彈演習。¹¹³

伍、結論

在中共戰略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從1927年中共領導而失敗的南昌起義以來，他們就認為中國共產黨必須要掌握軍事，因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要貫徹「黨指揮槍」的原則，使得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的設計上佔有極為重要的角色，同時中共軍事戰略也左右中共國家安全戰略的發展，這是中共戰略文化的最大特質之一。畢竟，「戰爭是政治的另外一種方式」，而軍事戰略則是為達成戰爭的政治目的，以及所實施軍事力

¹¹² 蘇長和，〈發現中國新外交—多邊國際制度與中國外交新思維〉，《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5年第4期，頁12。

¹¹³ 李文雲、孫力，〈反恐軍演意義深遠〉，參閱 <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013469.html>。

大量的戰爭準備和計畫，與進行戰爭的策劃過程，更是戰場和會戰的理論與實踐。

事實上，文化對軍事準則與部隊有極大的影響力，文化改變也是轉型的先決條件。從中共戰略文化的形成來檢視中共近年來所進行的軍事演習，可以清楚的理解到隨著環境的變遷，中共領導人戰略思維的改變，以及國際安全需求，中共對軍事演習出現多樣性的變化。然而，其中不變的原則是單邊主義模式的軍演，對台有特別的針對性，而且具有實戰之意義，但雙邊主義和多邊主義模式的軍事演習，則把它當成是中共進行軍事外交的一環，也是中共拉攏周邊國家的一個重要手段。例如中共多次透過軍演的機會，邀請其他國家前來觀摩，凸顯中共的新安全觀以及演習的沒有針對性，間接表達解放軍想與周邊國家表達友好關係。¹¹⁴

然而，在中共戰略文化的偏好中，並未改變以戰爭的手段來維護主權的觀念，在對台不放棄武力使用的前提下，讓他們對台海議題只有呈現維護主權完整性的思考，而無法接受可以跟台灣主政者把主權當成可以共同管理的議題，當然這也是台海議題一直是中共軍事權力無法作為地緣治理一環的原因，這就導致兩岸關係長久以來一直維持著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的主要因素。

畢竟，在一個相互聯繫的世界秩序中，一國僅僅通過單邊行動來展示它的軍事權力，並無法達到有效的安全目的，特別是在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已經變成是一種不可分割的時代，主權問題如果還是把它視為是一國內部的國家安全議題，那麼它只會帶來國家安全的困境，無助於區域與國際安全的穩定性，這恐怕才是中共對台灣的地緣治理方式一直遭到國際社會詰難，也無法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主要因。

同樣的，中共既使採取「睦鄰外交」的政策，希望透過雙邊或多邊主義的聯合軍演來達到軍事外交的目的，但對於隱約有針對性的國家如美國和日本，卻可能造成另一種不安全感的出現，所以中共既使透過聯合軍演來實現自身安全的目的，但最終也可能導致「安全困境」的發生，這並無助於中共

¹¹⁴ 《聯合報》，〈鐵拳軍演，受邀觀摩獨漏星國〉，2004年9月26日，版13。

所提倡的「和平發展」的方針。

特別是，中共的戰略文化所內涵的世界觀、戰爭觀和地緣戰略觀並未完全放棄具有擴張性質的主觀意識之下，要客觀性的讓人接受中共所舉行的軍事演習是為了追求和平，恐怕只能作為口號，並無法實質的成為一種國際的理念。因此，一國利用各種形式的軍事演習來追求和平，那可能只會是一種假象，而不是真理。

參考書目

一、英文

- Allen, Kenneth W. and Eric A. McVadon, *China's Foreign Militar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1999.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Booth Ken, and Eric Herring. *Keyguide to Information Source in Strategic Studies*. New York: Park Avenue South, 1994.
- , and Russell Trood, eds. *Strategic Cultur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St. Martin's Press, 1999.
- Bromwich, David. "Acting Alone." *Dissent*, Winter 2003, pp. 19-21.
- Burles, Mark and Abram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 Santa Monica, Ca: RAND, Army War College, 1995.
-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Dewar, James. et al. *Army Culture and Planning in a Time of Great Change*.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6.
- Gray, Colin S. "Geography and Grand Strategy."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1991), pp. 311-329.
- Hawkins, Charles F. "The Four Futures: Competing Schools of Military Thought inside the PLA." March 2000[Online], Http: <http://taiwansecurity.org/IS/IS-0300-Hawkins.htm> (text accessed 5 July 2000).
- J Lantis, Jeffrey 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2002), pp. 87-113.

- Jacobsen, Carl.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 James, Ferguson R. "Inclusive Strategies for Restraining Aggression- Lessons from Classical Chinese Culture." *Asian Philosophy*, Vol. 8, Issue 1(March 1998), pp. 31-46.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Katzenstein, Peter J.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in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Kier, Elizabeth. "Culture and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1995), pp. 65-93.
- Kinross, Stuart. "Clausewitz and Low-Intensity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7, No. 1(March 2004), pp. 35-58.
- Klein, Bradley. "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 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se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4 (1998), pp. 133-149.
- Klein, Yitzhak. "A Theory of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 No. 1, pp. 3-24.
- Lund, Michael S. *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s: A Strategy for Preventive Diplomacy*, 2d ed.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for Peace, 1997.
- Nye, Joseph S. and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n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Spring 1988), pp.5-27.
- O'Keefe, Michael. "Enduring Tensions in the 2000 Defense White Pap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 49, No. 4(2003), pp. 532.
- Pillsbury, Michael. *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Washington,

-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0)[Online], also available on Internet, Http: <http://www.ndu.edu/inss/books/pill2.htm>.
- Schneider, Barry R. and Jerrold Post, eds. *Know The Enemy: Profiles of Adversary Leaders and Their Strategic Culture*.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 U.S. Air Force Counter Proliferation Center, 2002.
- Snyder, Jack L.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Ca: RAND, 1977.
- Wendt, Alexander E.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1-425
- ,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Xuetong, Yan. "In Search of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World Affairs*, Vol. 1, No. 4 (1997), pp. 50-58.

二、中文

Wendt, Alexander.〈無政府狀態是由國家造就的：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刊於 James Der Derian 主編，秦治來譯，《國際關係理論批判》。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Wishnick, Elizabeth. 〈中俄聯合軍演同床異夢〉，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617&Itemid=47。
〈中國本月在東山島舉行三軍聯合軍演〉，參閱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taiwan/pages6/taiwan050704.html>。
〈中國近兩年來的重大軍事演習一覽〉。參閱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junshi/668177.htm>。
〈中國軍演的戰略威懾意義〉，參閱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4-07/31/content_1685823.htm。

- 〈解放軍攻臺料「島內決戰、島外決勝」〉，參閱 <http://news.1chinastar.com/l1/fanti/1320712.shtml>。
- 《中央日報》。〈北劍 16000 共軍演習，24 國觀摩〉，2005 年 9 月 28 日，版 6。
- 《中國時報》。〈軍演閉幕，強制隔離，部隊深入擊潰敵陣〉，2005 年 8 月 26 日，版 13。
- 《文匯報》。〈中俄軍演威懾潛在對手〉，2005 年 8 月 18 日，版 6。
- 。〈陽江軍演，176 個航班取消〉，2005 年 9 月 22 日，版 6。
- 《自由時報》。〈中國軍演，朝北方及內陸轉進〉，2005 年 9 月 23 日，版 3。
- 《聯合報》，〈鐵拳軍演，受邀觀摩獨漏星國〉，2004 年 9 月 26 日，版 13。
- 。〈北劍軍演，裝甲師對抗，史上規模最大〉，2005 年 9 月 28 日，版 13。
- 。〈海陵島，大規模軍演〉，2005 年 9 月 23 日，版 4。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海：人民出版社，1977。
-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 王崑義。〈中共的國際戰略與臺灣的外交選擇〉。《國家政策(動態分析)雙週刊》，第 156 期（1997 年 1 月 21 日），頁 31-32。
- 。《全球化與台灣—陳水扁時代的主權、人權與安全》。臺北：創世文化出版社，2001。
- ，與蔡裕明。〈和平崛起：轉型中的中國國際戰略與對臺戰略思考〉。《全球政治評論》，2005 年 1 月，頁 43-84。
- ，與蔡裕明。〈對臺戰略：「戰爭論述」與「非戰論述」的平衡戰略〉。收錄於《胡溫體制的平衡戰略：思維與政策》，，頁 223-266，由朱新民編。台北：遠景基金會，2005 年。
- 王崑義與蔡裕明。〈兩岸認同中的戰爭論述與非戰論述—2004 年三二〇以來的發展〉，刊於朱新明主編，《胡溫體制下的平衡戰略—思維政策》，頁 223-265。台北：遠景基金會，2005。

- 刑曉麗與曹建平。〈鄧小平的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9卷2期(1999年3月),頁50。
- 江澤民。〈江澤民在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02年11月8日。
- 何思慎。〈中共經濟發展戰略—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東亞季刊》,第23卷第4期(1992年4月),82-108。
- 何頻,〈解放軍演習被忽視的意義〉,參閱 <http://bjzc.org/bjs/bc/19/51>。
- 李小兵,〈北京對台兩手策略的由來與特點〉,《當代中國研究》(北京),1995年,第6期,(總第51期)。另參閱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950603&total=51#b1>
- 李文雲與孫力。〈反恐軍演意義深遠〉,text from <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013469.html>。
- 李慎明與王逸舟主編。《2004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 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
- 杜立平與田朝暉。〈解讀中俄聯合軍演:演什麼,怎麼演〉。《解放軍報》,2005年8月17日。
- 沈明室。〈中共戰略決策的文化分析〉,《東亞季刊》,第33卷第1期(2002年),頁1-23
- 周其仁。《農村變革與中國發展,1978-1989》。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 岳嵐。《高技術戰爭與現代軍事哲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
- 杭亭頓。《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黃裕美譯。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年)。
- 金正昆。《現代外交學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
- 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日、歐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 俞雨霖。〈毛澤東人民戰爭路線再度回潮〉。《中國時報》,1996年1月10日。
- 施正權。〈從比較戰略文化看戰爭與和平:以美國和中共為例〉。《哲學與文

化》，第 31 卷第 4 期（2004 年），頁 25-60。

胡錦濤。〈胡錦濤主席在法國國民議會的演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hzxcfosg/t59124.htm>, 2004 年 1 月 27 日。

-----。〈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2005 年 9 月 16 日，[text from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news/971778.htm](http://www.china.com.cn/chinese/news/971778.htm)。

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主編。《鄧小平戰略思想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

孫哲。〈結構性導航：中國「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方略〉，《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總第 280 期（2003 年 12 月），頁 58-63。

宮力主編。《鄧小平的外交思想與實踐》。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 年。

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治工作教研室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基本問題》。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1 年。

張召忠與周碧松。《明天我們安全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

張志學編。《中華小百科全書》，軍事學卷。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 年。

張亞中與李英明。《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台北：生智文化公司，2003。

莫大華。〈中共戰略文化初探〉。《中國大陸研究》，第 39 卷第 5 期（1996 年），頁 38-52。

-----。〈美國的戰略文化與戰爭方式〉。《美歐月刊》，第 11 卷第 11 期（1996 年），頁 37-54

-----。〈戰略文化：戰略研究的文化途徑〉。《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6 期（1996 年），頁 39-52

-----。〈戰略文化之研究〉。《國防雜誌》，第 11 卷第 11 期（1996 年），頁 73-85。

-----。〈戰略文化研究的辯論與趨勢--兼論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臺海飛彈危機事件的戰略文化研究〉。《復興崙學報》，第 75 期（2002 年），頁

- 73-93
-----。〈戰略文化與軍事準則理論之探討〉。《國防雜誌》，第 12 卷第 3 期（1996 年），頁 3-14
-----。〈戰略文化與國防政策--中華民國的戰略文化與軍隊文化〉。《國防政策評論》，第 1 卷第 4 期（2001 年），頁 33-56
- 郭臨伍。〈信心建立措施與兩岸關係〉。收錄於《信心建立措施的理論與實際》，頁 165-190。台北：台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2001 年。
- 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
- 馮玉軍。〈2003 年中國外交〉，《現代國際關係》，2003 年第 12 期，頁 37。
- 楚樹龍。〈全面建設小康時期的中國外交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3 年 8 月，總第 276 期，頁 8-13。
- 楊成緒。〈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鄧小平外交思想淺議〉。《光明日報》（上海），2004 年 8 月 9 日，版 1。
- 楊勝群與田松年主編。《共和國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1949-196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 楊潔勉。《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外交政策比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靳希民，《國際安全與安全戰略》。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
- 褚漢生。〈從解放軍戰爭思想的轉變探討中共「新軍事革命」的具體實踐〉。《海軍學術月刊》，第 36 卷第 10 期（2002 年 10 月），頁 19-30。
- 劉興祥。〈中共對高技術戰爭的認知界定與理論發展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7 卷第 5 期，2001 年 5 月，頁 89-103。
- 劉繼賢與張全啓主編。《毛澤東軍事思想原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
- 蔡裕明。〈法治的弔詭：中共『依法治國』的現實與考量〉。《中共研究》，第 36 卷第 3 期（2002 年 3 月），頁 27-36。
- 。〈中共軍事思想的調整與發展〉。《國防雜誌》。2001 年 7 月。
- 。〈資訊時代的戰爭〉。《國防雜誌》，第 14 卷第 6 期（1998 年 12 月），頁 87-97。

-----。〈2004 年中法海軍聯合軍事演習及其意涵〉，《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3 期（2005 年 3 月），頁 43-55。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戴逸與張世明。《18 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軍事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 年。

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等著，楊雪東等譯。《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顏聲毅。《當代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蘇長和。〈發現中國新外交—多邊國際制度與中國外交新思維〉，《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5 年第 4 期，頁 12。

